

NINGBO SHANGBANG
ZHONGGUOSHANGBANG CONGSHU



中国商帮丛书

◎ 林树建 林旻著



黄山书社

宁波商帮

宁波这座古老的滨海商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操奇计赢、精于谋算、顺应时尚、胆识独具、深谙商贾之道的宁波商人。宁波商帮崛起于明末清初。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声势煊赫，称雄商界，并且至今仍活跃在海外实业界。宁波商帮何以能后来居上、久盛不衰呢？



NINGBO SHANGBANG
ZHONGGUO SHANGBANG CONGSHU



宁波商帮



中国商帮丛书
◎ 林树建 林旻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商帮/林树建,林旻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7.6

(中国商帮)

ISBN 978 - 7 - 80707 - 712 - 1

I. 宁… II. ①林…②林… III. 商业史 - 研究 - 宁波市 IV.
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5447 号

书名:宁波商帮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7 层)

印装: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9.125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宁波商帮崛起的人文环境	5
一、滨海地区海洋文化影响	6
(一) 剡木为舟, 剡木为楫	6
(二) 地处海滨, 经商成风	7
二、通商诸国外来文化影响	8
(一) 泛海兴贩, 番舶鹜趋	8
(二) 洋行林立, 买办辈出	15
三、浙东学派思想文化影响	24
(一) 农末俱利, 工商皆本	24
(二) 经世致用, 乡俗崇商	25
第二章 宁波商帮嬗变的历史轨迹	29
一、初始形成时期	30

宁波商帮

(一)甬商资本,转向内地	30
(二)敬乡乐群,结帮经商	32
二、迅速发展时期	33
(一)贸易地域,迅速拓展	34
(二)各地会馆,相继创立	38
三、臻于鼎盛时期	42
(一)新式商人,脱颖而出	42
(二)万里行贾,贸迁四方	44
(三)经营项目,适时更新	49
四、转移海外时期	55
(一)劈波斩浪,迁徙海外	55
(二)新人辈出,代有强人	57
第三章 宁波商帮活动的主要地域	60
一、逐时趋利,无远弗届	61
(一)宁波商帮在北京	62
(二)宁波商帮在上海	64
(三)宁波商帮在汉口	77
(四)宁波商帮在天津	80
(五)宁波商帮在重庆	84
(六)宁波商帮在沙市	87
(七)宁波商帮在苏州	88
(八)宁波商帮在杭州	89
(九)宁波商帮在温州	101
(十)宁波商帮在其他地域	106
二、措资结队,远涉海外	109
(一)宁波商帮在我国香港和澳门	111
(二)宁波商帮在我国台湾省	117
(三)宁波商帮在日本	121

(四) 宁波商帮在欧美各国	124
(五) 宁波商帮在东南亚地区	128
第四章 宁波商帮经营的主要行业	132
一、保持特色的传统行业	132
(一) 银楼业	133
(二) 药材业	137
(三) 成衣业	144
(四) 海味业	152
(五) 民信业	153
二、凭借发迹的支柱行业	155
(一) 沙船贩运业和轮船航运业	155
(二) 钱庄业和银行业	169
三、顺应时尚的新兴行业	192
(一) 进出口贸易	193
(二) 五金颜料业	196
(三) 钟表眼镜业	199
(四) 呢绒洋布业	205
(五) 日用洋货业	210
(六) 化工西药业	215
(七) 房产地产业	218
(八) 保险信托业	220
(九) 证券交易业	222
(十) 新式服务业	224
(十一) 公用事业等	227
第五章 宁波商帮群体的人文特质	229
一、驾驭机遇, 趋时求新	230
(一) 冒险创业, 胆识独具	230
(二) 顺应时尚, 赢得未来	232

宁波商帮

二、手腕灵活,精于谋算·····	233
(一)机敏善变,手腕灵活·····	233
(二)操奇计赢,精于谋算·····	236
(三)以人为本,管理有方·····	239
三、诚信笃实,恪守信用·····	241
(一)诚实经商,弃取有道·····	241
(二)恪守信用,信誉卓著·····	245
四、敦重乡谊,和衷共济·····	247
(一)素重乡谊,风雨同舟·····	248
(二)相互扶持,共御风险·····	249
五、奋袂同仇,正气凛然·····	252
(一)抵御外侮,义愤填膺·····	252
(二)力挽利权,杜塞漏卮·····	256
(三)芥视千金,赞助革命·····	259
六、清操励俗,扶困济世·····	261
(一)崇尚俭朴,志趣儒雅·····	262
(二)施仁布泽,造福社会·····	265
主要参考文献·····	278
后 记·····	284

前 言

宁波,是一座古老的滨海商城。民国《鄞县通志》载,这里“市廛云连,巍墙高矗”,“夹道商铺,鳞次栉比”。

宁波古称鄞、鄮县、明州。明代避国号讳,改为宁波。相传,洪武十四年(1381),明州才子单仲友应征赴京献诗,受到明太祖朱元璋赏识。一天,太祖龙颜和悦,仲友乘机启奏:“臣籍明州府,明与国号同,臣以为不妥,请万岁爷改之。”太祖觉得有理,沉思片刻,说:“你们那里有个定海,海定则波宁,就改为宁波府吧。”从此,宁波这个地名沿用至今。

宁波简称甬,宁波商人亦称甬商。宁波之所以简称甬,是由于境内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甬江,则以流经甬山得名。甬山之称甬山,据说甬为古代铜钟的象形字,甬山状如覆钟,形似甬字。宁波,别称四明,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四明山脉大俞山有四窗岩,

宁波商帮

清雍正《浙江通志》卷十三载：“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宿之光，故曰四明山。”甬商往往以四明作为宁波代称，在同乡组织或企业前冠以四明，如四明公所、四明会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四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明大药房等等。

· 商帮，是地域性商人群体。宁波商帮，泛指在外埠以地缘乡谊为纽带联结而成的宁波籍工商业者群体。上述概念的内涵外延界定如下：

其一，宁波商帮是指以地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公所、同乡会为联络场所，结帮经营的工商业者群体，而并非从事单独、分散经营活动的工商业者个体，或凭血缘姻亲关系结伙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业者家族。商人个体或商人家族从事经营活动，早已有之，而商帮的出现，则在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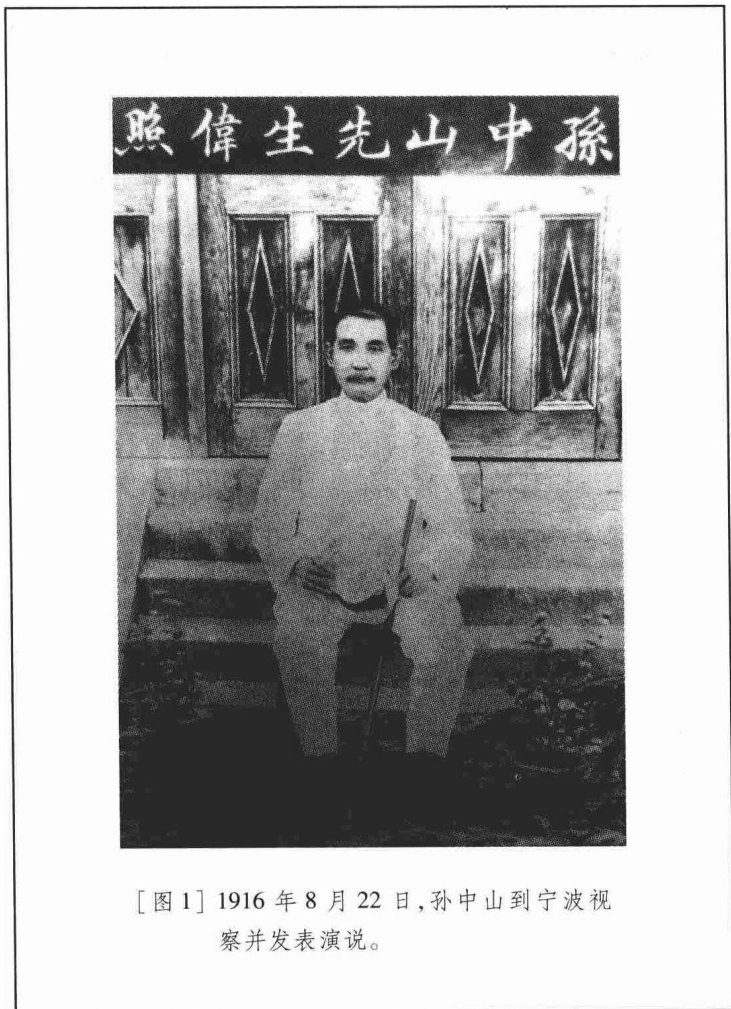
其二，宁波商帮，主要指从事商业，以及与商业密切相关的金融业、航运业、工业和建筑业等经营活动的实业家。这里所说的商人，乃广义的商人。民国3年(1914)3月2日以大总统令颁布的《商人通例》，有大总统印鉴，国务总理孙宝琦、农商总长张謇的签字。该《商人通例》称：商业，包括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钱业或贷金业、担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栈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或代理业等十七个门类。从事上述各业，自经呈报该管官厅注册后，一律作为商人。

其三，宁波籍人氏，是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南田)六县人氏。余姚、宁海现在隶属宁波，且历史上与宁波经济联系密切，习惯上宁波商帮也包括余姚籍和宁海籍人氏。

其四，宁波商帮，一般指在外埠结帮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业者，不包括在本县或宁波府地域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工商业者。

《中国会馆志》称,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群体利益整合组织。乡谊、地缘、商情是其联结纽带;趋利共享是其整合动力;避祸共存、权益分担是其心理依托。会馆可以满足客居异地的移民群体八项心理需求,即政治维护心理、市场赢利心理、客地相依心理、权益捍卫心理、文化交融心理、管理自治心理、风险避害心理、前景开拓心理的需求。孙孚凌先生认为,会馆是缘于乡谊而建立的群体性的自卫自律自治组织。中国历史上的会馆,明永乐年间在北京首见雏形,经发展演变,到清末始趋衰落;而华侨在世界各地所创建的华人会馆,至今仍兴盛不衰。上述对会馆的阐释,很有见地。创建会馆,是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

《四明公所义冢碑》称,“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宁波民性通脱,素善经商,行贩坐贾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宁波商帮崛起于明末清初。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声势煊赫,称雄商界,并且至今仍活跃在海外实业界。清同治年间,德国地质学家希霍芬曾七次到中国作学术考察。他深有感触地说:“宁波人在勤劳、奋斗努力,在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宁波人是浙江人中的特殊分子……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孙中山先生也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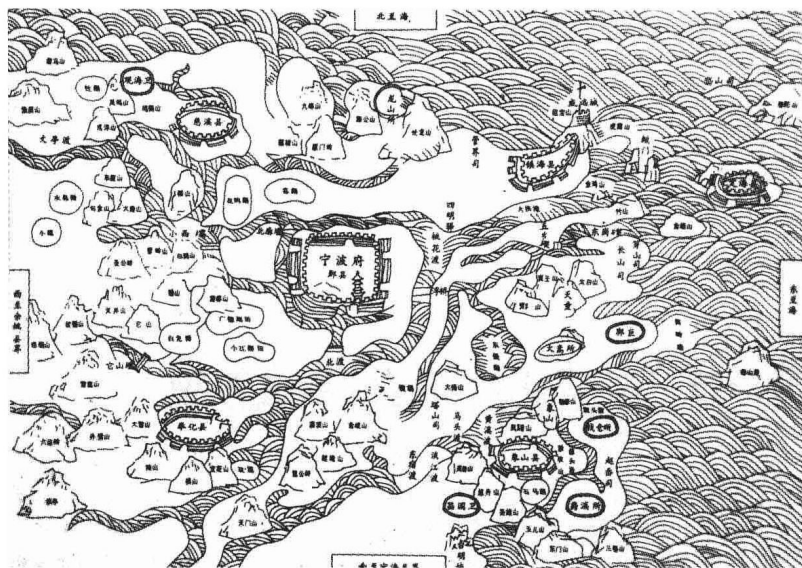


[图1] 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到宁波视察并发表演说。

第一章 宁波商帮崛起的人文环境

宁波濒临东海,扼我国南北水路要冲,素有浙东门户之称。这里海道辐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陶瓷之道的启航港之一。宋宝庆《四明志》曰:“鲸波万里,如履坦途”,“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清雍正《宁波府志》也称:“宁郡六县,县皆滨海”,“西南自岭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宁波作为滨海商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经营有方、深谙商贾之道的宁波商人。

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宁波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本地域人群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有重要影响。宁波商帮正是在滨海地区海洋文化、通商诸国外来文化、浙东学派思想文化的多元影响下崛起的。



[图2] 清雍正年间宁波府地图(重绘)

一、滨海地区海洋文化影响

(一) 剡木为舟, 剡木为楫

宁波经济开发甚早。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已在这片土地上营构定居,农耕渔猎,创造灿烂的原始文化。河姆渡遗址中曾发现独木舟残骸、木桨遗存和舟的模拟艺术品陶舟,以及用作制造独木舟的有段石镞。可见,其时先民已懂得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始过“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卷第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的水上航行生活。舟楫的发明不仅使河姆渡人得以下

海捕鱼,还可以沟通原先为江河阻隔的四邻部落间的联系。1982年,在渤海湾海底发现一件侈口陶釜。这种陶釜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而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这是河姆渡人海路航行到达渤海湾的重要物证。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贝尔德姆认为,澳大利亚居民的祖先是河姆渡人,那里的文化也是从河姆渡飘流过去的。这些,都是以后宁波商人擅长航海,从事沿海埠际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历史渊源。

(二) 地处海滨,经商成风

秦代以前,宁波商贩已为数不少。宋乾道《四明图经》曾载:“鄞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县居鄞山之阴乃加邑为鄞。”乾隆《鄞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鄞,易也。……與地志曰:邑人以其海中物产于山下贸易因名鄞县。”所谓海人,是指近海岛屿上的鱼贩盐商和沿海地区的商贩村民;邑人,则指本地商民。可见,当时鄞山一带已是邻近地区农副产品和海产鱼鲜集散地,有一批商贩聚集在这里持货贸易。

秦汉以后,宁波修筑堰坝,开垦湖田,乡民“衣食常充”。海上航路,北至辽东,南及交趾,“泛海长驱,一举千里”,贸易地域进一步拓展。

唐宋时期,“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元代,出现专营闽、粤土产的南货号 and 专营东北、鲁豫土产的北货号,其时有海运船户千余家。明代,宁波的海舶河舟,可通关东、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四川、湖南、湖北、广州、福建等地。清初,商贾聚于宁波三江口,滨江列肆,百货咸备。乾隆年间(1736-1795),城区有较大店铺七百余家。宁波江夏,唐即有市。宋代以后,商船停泊奉化江畔,客商云集。清嘉庆、道光年间,商船海舶停泊在三江口一带,“巨艘帆

宁波商帮

檣高插天，桅楼簇簇见朝烟”，蔚为壮观。与东门口、半边街、双街、钱行街、糖行街、灵桥门、东渡路形成繁华商业区，谚称“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夏”。

《慈溪县志》称，县人旅外经商者，东部尤众。鸣鹤一地，几占居民十之八九。又称，经商成风，乡民往往亦农亦商，农忙务农，农闲经商跑“单帮”，从事贩运业。一旦经商有成，即携亲带友。津、汉、沪、杭各大城市，无不有甬商足迹。

宁波人生长海滨，长期从事海外贸易，“餐风宿水，九死一生”的海上生活，生成博击风浪、履险不惊的刚毅性格和冒险创业、不惮险阻的人文精神。《定海县志》说，“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航海梯山，视若户庭”。正是这种海洋文化的长期积淀，使宁波帮实业家趋时求新，胆识过人，四出营生，无远弗届。

二、通商诸国外来文化影响

（一）泛海兴贩，番舶鸞趋

在日本弥生文化后期（相当于中国东汉、三国时期），日本商人即开始驾船泛海来会稽郡贸易（时宁波属会稽郡）。据《三国志》记载，这些商人主要到会稽买布。他们到会稽，免不了先驻足宁波，并同宁波商人有贸易往来。唐宋以来，宁波贾舶商舸，羽集鳞萃，番商鸞趋，洋货杂陈。商民泛海兴贩，同外国商人往来频仍，深受外来文化濡染。

“唐宋市舶，遥达海外”（民国《鄞县通志》序）。日本学者桑原骈藏作过考证，明州（今宁波）、福州、温州、松江等地，都是唐代中国的贸易港。据《宁波市志》记载，日本遣唐使舶，曾多次抵达明州。如天宝十一年（752），日本孝谦朝遣唐使舶3艘抵明州。贞元二

第一章 宁波商帮崛起的人文环境

十年(804),日本桓武朝遣唐使船1艘127人抵明州。开成三年(838),日本遣唐使船2艘抵明州。当时日本航海技术还比较落后,来华需冒着漂流覆舟的危险,“遣唐使有时候也就是奔向地狱的使者”,不少人借故逃避,不肯出使。为此,在遣唐使临行时,日本朝廷往往赐给丰厚的物品。遣唐使到明州后,允许入京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只能留在明州。“他们要引领遥望,焦急地等上几个月,有时甚至是一年之久。”这段时间这些人便拿临行时日本朝廷所赐的物品与明州商民“私相交易”。即使入京的遣唐使,将返回日本时,也有“下船往市”的。所以遣唐使每次回国总携带很多货物。日本朝廷为此在建礼门前搭起三个帐篷,称为宫市,向臣下标卖中国的杂货。唐时,中日民间私人贸易也很兴盛。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唐时泛海兴贩去日本的中国商人,南路照例从明州出发,即使从福州、台州等地启航的海船,一般也先到明州停泊,然后再从明州开出,横渡东海,到达值嘉岛,再驶进博多津。大海商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都曾自备船舶,往返于日本与明州。《宁波市志》曾载:唐会昌二年(842)春,李邻德的商船自明州启航赴日;大中元年(847),张支信等37人驾驶商船由望海镇(今镇海区)启航,抵达日本肥前国值嘉岛那留浦(今五岛列岛和平岛);大中三年(849),李延孝、张支信等53人乘商船赴日贸易。

当时明州不仅有大批日本商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新罗(今朝鲜)和阿拉伯商人。

北宋时期,明州是全国三大贸易港之一。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在《王司徒定海监酒税》诗中称:“悠悠信风帆,杳杳向沧岛。商通远国多,酿过东夷少。”宋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置明州定海。咸平二年(999),在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明州还设来远驿,招待外国商人。那时明州是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陶瓷之道”的启航地,为接待阿拉伯商人,市舶务西设有波

斯馆,狮子桥北建有清真寺。开赴日本、高丽(今朝鲜)的商船大都在这里放洋。日本、高丽海舶来华,也麇集明州。宋乾道《四明图经》称:“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资丰衍”。明州商人朱仁聪、曾令文、周文德、周良史、王满、卢范、潘怀清、孙忠、张仲尧、李先、孙俊明、郑清节等多次往返于明州与日本之间贸易。有的还受宋朝政府和日本太宰府委托,为他们传递文牒礼品。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研究,两宋时期,沿海各地去高丽贸易的中国商船,包括广东、泉州、福州、台州等地的商船,习惯于从明州启航。明州成为沿海地区的海运枢纽。从南方运来铁、木材、糖、染料、麻、胡椒、香料和象牙,从北方运来丝,从日本运来木材、硫磺、水银、黄金和珍珠,而宁波运出的主要是丝、瓷器、漆器、药材、香料、印刷品、文具、草席、银币和铜币。神宗元丰八年(1085),宋廷解除了对高丽通商的禁令,并限定只有明州市舶司签发的船只才允许开赴高丽,明州港与高丽礼成港之间,“来船去舶首尾相连”。据郑麟趾《高丽史》记述,熙宁以后明州商人发舶赴高丽经商的有120多次,每次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

宋室南渡,明州更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开庆《四明续志》卷四称:“四明为浙左大都会,城邑井市,人物阜繁。”其时,有不少日本商人来宁波贸易。官府念及“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自宝祐六年(1258)始,对为风浪所阻的来华日商,每人日给米二升,日支钱一贯五百文,候次年归国日止,以示怀远之意。徐兆昺在《四明谈助》卷十三中说,明州开明坊前后的大市、中市和后市,百货凑集,四方商船泊满划船场。斯波义信在《宁波及其腹地》中说,南宋开庆元年(1259),宁波沿海有将近8000艘航海帆船、小帆船和渔船。其中,属于鄞县人的624艘,定海(即后期镇海)人的1191艘,象山人的776艘,奉化人的1699艘,慈溪人的282艘,舟山(当时称昌国县)人的3324艘。